

解读“红楼”文本
破译“红楼”奥秘

红楼梦

B面解读

● 胡邦炜 著

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 B 面解读

胡邦炜 著

责任编辑：李晓峰

封面题字：罗玉平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B 面解读/胡邦炜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 7-5366-5772-2

I. 红... II. 胡...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 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122 号

《红楼梦》B 面解读

胡邦炜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80 千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66-5772-2/I·1099

定价: 25.00 元

喜欢读《红楼梦》的男人

——代序

大约在十年前，我陪同日本青年女汉学家，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冈崎由美副教授参观成都武侯祠。在诸葛亮纶巾羽扇的塑像前偶然谈起了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冈崎君说：在日本，女孩子大都喜欢《三国演义》，而男孩子大都喜欢《红楼梦》……

她的这个说法令我大吃一惊，我立即脱口而出道：“这不正常啊！应当是男孩子喜欢《三国演义》，女孩子喜欢《红楼梦》才对啊！”冈崎君惊异地看了我一眼，立即反驳道：“您那个说法才不正常呢！《三国演义》充满了阳刚之气，女性喜欢它是很正常的；而《红楼梦》充满了阴柔之美，男性喜欢它也是很正常的。怎么会是相反地去喜欢呢？”接着她又列举了她的学生们写毕业论文的例子：女学生大都选《三国演义》作论文题目，而男学生则大都选《红楼梦》作论文题目……对此，我既感到很不对劲儿，又无法找出理由反驳，及至后来去日本访学时，发现情况与她说的确一样，于是引起我的思索。

我反复思索后，得出了一个令我颇感痛苦难堪的结论：难道是因为我们中国男人真的在变得弱化和女性化，才需要从《三国演义》之类雄风十足的作品中去寻求心理上的补偿与满足吗？……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关于中国男人弱化的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热点，一些大众传媒也颇为关注。

“寻找男子汉”和“阴盛阳衰”几乎成为一个时尚的话题，我的这一感觉便更加强烈了。然而我却似乎没有见到关于我们中国人在《红楼梦》这部书性别爱好方面的文章。直到三年多以前，我偶然读到梁晓声先生在《凝视’97》一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才发觉也有人思考这一问题，而且由于视角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意思——梁氏认为：“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梁晓声于是认为：“中国之读《红楼梦》的男人，渐变得女里女气，也就不足怪了。”

我无疑也算是“读《红楼梦》的男人之一”，他的这一警告不能不令我惶恐，虽然我迄今仍未“变得女里女气”，也从未曾有过任何“服官政”的“向往”，更无找“红颜相陪打发寂寞”的奢望。仔细想来，我却认为梁氏的话很难令人信服，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读《红楼梦》又特别是那些喜欢读《红楼梦》的男人，恰恰都是阳气最盛、男人气最足，而且其中不乏具有顶天立地英雄气概的男人——如毛泽东主席，他之爱读《红楼梦》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目前从文献中可以搜集到的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评论文字，无疑以《红楼梦》为最。此外，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他还不止一次地谈起这部书。如“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开玩笑地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



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徐海东老实回答：‘没读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①

1965年，毛泽东在与其表侄孙女王海蓉的谈话中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②至于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把《红楼梦》与我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相提并论。评价之高，充分说明了《红楼梦》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尽管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于他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更是他爱读此书的一个铁证。

我想任何人也不会认为毛泽东这位十分爱读《红楼梦》的男人“女里女气”吧？恰恰相反，直至今天，尽管人们已不再把他当“神”看待，对他的某些错误也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之后，在承认他是一位顶天立地，最有勇气魄力、最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这一问题上，肯定没有任何分歧的。

再如鲁迅先生，他之爱读《红楼梦》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十分推崇和看重。不仅在他编撰的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给予《红楼梦》一个专篇的位置，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作了篇幅最大的评述，而且还先后在二十多篇文章中提及、论及该书。鲁迅对《红楼梦》的论述深刻而犀利，涉及的内容亦很丰富，由于他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评红论著也就具有了同样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甚至迄今仍常被人们引用并奉为主臬。

①、②董学文：《毛泽东与中国文学》，P-275，P-777。



对于鲁迅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想包括梁晓声先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会认为他“女里女气”吧！相反，直到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一致承认他是一位“骨头最硬”、阳刚之气最足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男子汉！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无愧为一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敢说敢为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同样，像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伯……这样一些“爱读《红楼梦》的男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女里女气”的。他们无疑都是中国男人中的佼佼者，是最男性化的男人！蔡、胡二位姑且不论，王国维、俞平伯二位可谓典型的“文弱书生”，地地道道的学者型文人。然而王国维敢于在现实与他的膺服皈依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冲突并且无法调和之时，毅然自沉昆明湖以明心迹，无疑比之许多见风使舵、苟且于世的赳赳武夫（他们大抵都是不读《红楼梦》的）更像个男人的样子！俞平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坚韧地活着，头顶批斗辱骂的巨大政治压力，也并未屈从，公开承认自己“反动”，但不承认自己是“权威”，岂不比当时许多男人更像个男人的样子？！

“无情未必真豪杰”，也许恰恰正是那些真正的男人，那些阳刚之气甚浓、男性心理十分健全的男子汉才懂得如何去欣赏洋溢着阴柔之美、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深刻博大的《红楼梦》吧！因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强者往往更懂得尊重女性，更懂得如何去体察并尊重女性的感情心理，更懂得如何去欣赏女性的美丽和似水柔情。

如果我的这一分析能够成立，我倒是希望中国多一些爱读《红楼梦》的男人。

是为序。



目 录

喜欢读《红楼梦》的男人——代序

第一章 关于历史文化背景	1
〈一〉满汉之间：文化上的斗争与融合	4
〈1〉从“三寸金莲”说起	4
〈2〉满汉文化交流碰撞的硕果	8
〈二〉小说本事与历史事实的若干传闻	12
〈1〉皇帝与江南名妓的罗曼史：顺治与董小宛	12
〈2〉少年诗人的幽怨情怀：纳兰容若与《金缕曲》	19
〈3〉大贪官的家庭秽闻：和珅与他的妻妾们	29
〈4〉百年宫廷秘史：康雍乾三朝掌故	33
第二章 关于文本的若干解读	48
〈一〉从石头的故事到红楼之梦	50
〈二〉《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指向	57
〈三〉应当选谁作妻子：薛宝钗的处世哲学	62
〈四〉“意淫”与性爱：“好色不淫”与“情而不淫”	69
〈1〉关于“意淫”	70
〈2〉“太虚幻境”与“风月宝鉴”：关于性梦	75
〈3〉口腔快感：关于性的语言宣泄	80
〈4〉“好色即淫”：《红楼梦》中的性描写	83



〈5〉《红楼梦》中的同性恋	86
〈6〉绣春囊与现代黄色录像：性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	88
〈五〉关系网与护官符	92
〈六〉探春治理大观园与现代承包制	99
第三章 关于哲学思想的若干解读	105
〈一〉佛：“云空未必空”	106
〈1〉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人们	108
〈2〉“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妙玉之谜	112
〈3〉“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121
〈4〉脱离人生苦海的逃路	125
〈二〉儒：补天与被弃	132
〈1〉“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贾政其人	133
〈2〉叛逆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贾宝玉的另一面	140
〈3〉补天不成的哀痛与被弃红尘的无奈	142
〈4〉贾雨村的人生之路	147
〈三〉道：复归与逍遥	156
〈1〉佛道不分与佛道互补	157
〈2〉呆气与赤子之心：复归本性	163
〈3〉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精神的逍遥	168
〈4〉甄士隐的人生之路	173
第四章 《红楼梦》诗、词、曲的解读	180
〈一〉悲情的诉说：林黛玉的诗	181
〈二〉抱负的诉说：薛宝钗的诗	200
〈三〉豪放潇洒者的自况：史湘云的诗	207
〈四〉诗谜与外国人的诗：薛宝琴的诗	213



第五章 解读曹雪芹	231
〈一〉 家庭背景：从富贵到贫贱	233
〈二〉 生活经历·思想性格：诗酒与狂放	241
〈三〉 创作动机的解读	273
第六章 20 世纪红学研究三大派别解读	287
〈一〉 索隐派·蔡元培：革命与排满	289
〈二〉 考证派·胡适：“自传说”与实验主义	299
〈三〉 社会历史学派·毛泽东：政治·历史与阶级斗争.....	311
后 记	330
附录	334
〈一〉 京华盛会说红楼	334
〈二〉 重访毛泽东力荐的年轻人李希凡	345
〈三〉 二十世纪红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356



第一章 关于历史文化背景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作为小说，其故事和人物当然都是虚构的，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综合，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这是文艺理论的起码常识。

然而任何小说都产生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它就不能不与当时代的历史发生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能是宏观的——即当时的思想状貌，时代风习，也可能是微观的——即当时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意何新如下的观点——他在《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一文中认为：“关于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陈氏（陈寅恪）特别指出，应注意个性与通性的问题。小说中的个性往往是假托的。例如小说中的人物姓李，而真正的人物未必姓李；小说写开元年间的事，而实事未必发生在开元。其道理就在于，小说是作者所构拟的一个象征系统。但小说既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发生，就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大量的时代内容和文化意识，其所以能够被用来研究历史，原因亦在于此。只是史学家应善于从中剔除掉那些假托的象征性意象，而发掘出被层层积埋的历史通性和文化隐义。陈氏更进一步指出，小说的署名亦是值得研究的一项。古人著书署名常常假托；但其托名则又必有文学的、语言的、政治的或社会的来历而决非随意假托。再者，小



说的写作总带有一定的目的。作者对所牵涉到的政治上的问题，顾忌一定很多，只好用其他手法掩饰。”^①

对于陈寅恪的这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何新认为“实际上是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负载有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他认为批评家应通过他的工作，将这个作品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予以还原，分析和揭示出这个结构在功能上和意义上的各个潜隐的层面。”^②而且他认为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接近于传统的朴学，而实际上更接近于近现代西方的阐释学或解释学。解释学一方面不同于校勘，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文学批评。校勘只是为了证实或确立原文而确认可靠的版本，文学批评则只是根据美和善的定义对原文作出价值判断。而解释学却是专门研究传递到书面文字中的语言符号的解释的。不管原文是一个梦，一个神话，一条法律，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份电报，人们只靠单词或句子都不能理解“作品”——至多只是理解“作品”的表层，只有依靠构成作品的更大的单位作为理解的向导，才能真正读懂一部作品。

为了确证这一观点，何新举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的文章，通过对牛僧孺在《续玄怪录》中“辛公平上仙”的传奇故事的解读和破译，发现了其中潜隐着的一个前人都未发现的秘密，这就是作者李复言实际上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皇帝被宦官所杀之史实。”也就是说，这个传奇故事的表层是“辛公平上仙”，而其深层所指的是一个皇帝被宦官阴谋杀死的惊心动魄的史实。他的破译和解读最终得到了证实：卞孝萱通过周密的考证，发现了作者李复言就是参

①、②何新：《危机与反思》，P-2426。

与永贞改革的李谅的别字，并确证了这篇小说所写的正是顺宗皇帝被杀的隐事。这一例证即说明了陈寅恪先生在文学研究中犀利的史识，也证明了使用“解释学”的方法来深入地研究文学作品的确能够发现很多前人没有发现的深层史实和深层意义，从而对作品的文本理解得更加全面、准确。

由此，我便很自然地联想到在红学研究派别中曾有很大影响的索隐派来。自蔡元培先生首创索隐派红学以来，由于其方法的不科学、论证的不严密和结论的太牵强附会，很快就被以胡适为首的考证派新红学所击溃。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索隐派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从红坛上消失，反而在十分曲折艰难的环境中蜿蜒发展，并数次形成一定的影响和气候。海外姑且不论，到了90年代竟然在大陆上蔚然形成气候，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作为一种学术见解或曰学术派别，它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声势和影响，其中一定有其合理因素存在。尽管我决不同意索隐派的很多观点，如《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政治小说，是影射雍正篡位夺权，是写“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等等等等；更不同意把书中的人物坐实为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把书中的某一事实坐实为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是我却同意该书中肯定隐潜着当时大量的“时代内容和文化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对该书文本的解读“而发掘出已被层层积埋的历史通性和文化隐义”。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一个思想钳制十分严重、文字狱恐怖气氛十分强烈的时代的作家，他的顾忌一定很多，便不能不用很多手段来掩饰那些可能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内容。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准备首先把《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以往索隐派指出的与该书有所关合的史实来展开叙述，或许能够对我们深入认识该书有所启迪。



〈一〉满汉之间：文化上的斗争与融合

〈1〉从“三寸金莲”说起

《红楼梦》中描写了众多美丽的女性，但是她们到底是大脚还是小脚？她们到底是否缠过脚？从书中却一点也看得出来。

这个看似细小的问题其实不小，因为它涉及到该书作者及其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大洋彼岸的几位美国红学家发现并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论以后，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都知道，在宋明以后，汉族女性都是要缠脚的。因此在古代小说中，凡描写到女性的美时往往都要提及“三寸金莲”，可以说，在宋明以后，一双小脚是美女的必备条件，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容貌和身材。不管一位多么美丽的女性，如果她是一双大脚，则绝对不会被承认为美女，甚至有嫁不出去的危险。“金莲玉笋”——一双雪白的小脚，这是古代文人向往和赞美的对象。《金瓶梅》一书可以说将这种不健康的审美趣味发挥到了极致。在该书第一回写潘金莲之所以被张大户看中买回来当侍妾，就是因为“她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潘金莲这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她那双小脚——“三寸金莲”的原故。在《金瓶梅》一书中多次写到女性的小脚，而且总是将它与讨得男性的欢心联系到一起。这无疑是当时普遍审美心理的真实写照。在古代一些庸俗无聊的文人心目中，小脚即金莲



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甚至到了“爱莲成癖”的地步，“三寸金莲”不仅在诗文中大量出现，成为讴歌的对象，甚至还出现了“妓鞋行酒”的咄咄怪事。当时的妓女无疑都是缠过脚的——就像今天的“三陪女郎”都要整容美发一样，因此她们的鞋子当然也是很小的，于是便有无聊的文人把酒杯放在小鞋子里面喝酒。《金瓶梅》第六回里就描写西门庆把酒杯放在潘金莲的小绣鞋里喝酒——这正是当时社会风习的真实写照：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就记载着当时的江南名士何元朗在宴客时公然用“妓鞋行酒”，而文坛领袖之一的王世贞竟“作长歌以纪之”。这种情况实在只能说是一种畸形病态的审美心理了！

但是在《红楼梦》这部着力描写女性美的书中，却几乎见不到关于女性脚的描写。这一点，尽管为人们所忽略，但它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的问题。其实在清代已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1984年在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发现并由巴蜀书社影印出版的清代佚名氏所著的《读红楼梦随笔》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红楼梦》状诸美，但言面貌、姿致、体态丰神，不及裙下双弯，或谓是书写旗人无金莲玉笋之足状，故略之？……

他的这一看法当说很准确：因为满族（旗人）该妇女都是不缠脚的。不描写女性的脚或回避描写，证明了该书作者曹雪芹的满族文化背景，他的先祖虽为汉人，但其家族入旗已久，是为“正白旗包衣”，在他身上，满族文化打下的烙印无疑是很深刻的。因此，在他的审美观念中压根儿就没有小脚为美的概念。不仅《红楼梦》中所有的美丽女性都没有“金莲玉笋”的描写，相反，在某些场合还暴露出她们身上游牧民族的遗风。在



第四十九回中，其回目便叫人大吃一惊——“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脂粉香娃”当然是大观园中那一群美丽的年轻女性，“割腥啖膻”几个字却使人恐怖：那些美丽的少女们为什么要“割”那“腥”味的，“啖”那“膻”气的东西呢？在汉族的饮食习惯又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的汉族饮食习惯中，是十分厌忌“腥”“膻”的，认为是“腥臭”、“膻骚”。然而大观园中那一群身出名门的大家闺秀却认为是美味：在一个雪花飞舞的严冬日子里，她们竟把“新鲜鹿肉”“要了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又玩又吃”。这难道还不使人感到特别的扎眼吗？

小说对这吃鹿肉的场面有十分生动细致的描写：宝玉向凤姐要了一块新鲜鹿肉，命婆子送入园中的“芦雪庭”，黛玉不见宝玉和湘云，便说：“他两个再到不了一处，若到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说明宝玉、湘云见到鹿肉的馋状。前来看热闹的李婶对此情况大惑不解，说道：“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得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李婶对吃“生肉”感到惊奇不解，自属正常人的思维，因为她是大观园外的人，不谙园内事情。然而嫁到园内并熟知内情的李纨却不以为怪，她立刻找到宝玉和湘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哪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便进一步证明他们确有吃生鹿肉的习惯。这一习惯显然是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习惯。后来真到了吃鹿肉的时候虽未生吃，但却是烤着吃，李纨还特别叮嘱“仔细割了手，不许哭”。这说明在吃烤鹿肉时用了刀子的，再一次显示出游牧民族的饮食风习特征。在这一回中，宝玉、湘云、平儿、凤

姐都表现出吃烤鹿肉的嗜好，宝钗劝宝琴也吃，并说：“你尝尝，好吃的。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说明宝钗和黛玉也喜欢吃此类食品。黛玉说：“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湘云却这样答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儿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好一个“腥膻大吃大嚼”！岂不是揭了那一群名门闺秀都是旗人的“老底”。

满族入关并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之后，虽然也曾试图保持他们的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态，以示与汉民族的区别。然而他们人数既少，又处于比他们更先进的强大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便不得不向汉文化学习，虽然入关百年后他们大部分已经汉化，然而其固有的生活习俗仍有一些保留下来。就如同海外华人生活在欧美时间较长后，虽然被洋化或半洋化，但仍然保持着过春节，敬祖先……等习俗一样。在饮食问题上，也许民族习俗的遗传特征更为稳固，所以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饮食爱好、口味和进餐方式。在汉族地区，由于农业文明成熟得较早，是以大米（南方）、面粉（北方）为主食，肉类和蔬菜是作为菜肴来“下饭”的。而且在汉民族中肉类是以猪肉为主，吃鹿肉尤其是吃烤鹿肉，显然是东北满族饮食习俗的遗风。

曹雪芹的家庭入旗时间甚久，他无疑具有满族文化的背景，对满族文化也有一定的认同感。如果我们承认此点，那么索隐派红学家们所认定的《红楼梦》是一部隐有深意的著作，“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因此它是一部“利用小说来反清的政治小说”的论点，自然就难以令人信服了。毫无疑问，该书对满清统治者有所揭露和批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作者并不是站在汉族立场上进行的，这也是不争的事

